

民为邦本、为政以德，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治国理政的优秀政治经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元素之一，也是当代中国进行国家治理的宝贵思想资源。

“民为邦本”是中华民族民本思想的凝练表达

泱泱中华，涓积江河。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国古代贤哲在总结和把握天地大道运行规律与历代王朝兴亡演替经验的基础上，善于把握变化中的不变，从实现“良政善治”的目的出发，洞察到人民是立国之基、民心是政治之本的客观规律，将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作为治国理政的根本出发点，将“民为邦本”作为治国理政的核心理念，形成一整套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传统。《尚书·五子之歌》中提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尚书·无逸》中有“保惠于庶民”“怀保小民”，《尚书·盘庚》中有“重我民”等记载，彰显了“民为邦本”的思想观念，是先民们最早认定的政治理想之一，开启了中国古代“民为邦本”的治理思想传统。

《礼记·缙衣》中记载，“子曰：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荀子·哀公》中指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孟子明确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贾谊指出，“民无不为本”“民为国本”“民为政本”“民者，万世之本”；王符提出，“民为国基”；唐太宗指出，“君依于国，国依于民”；柳宗元提出，“吏为民役”；从朱熹的“新民”思想、王阳明的“亲民”思想到顾炎武的“厚民生，强国势”，再到黄宗羲的“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的主张，王夫之的“宽庶民，严吏治，重民情”的倡议，等等。这些民本思想的经典表述经过历朝历代的丰富发展，都强调了人民是国家的基础，民心是国家的命脉，“政



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等治理思想，贯穿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演进史之中，培育和发展的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

“为政以德”蕴含中国传统政治文明中深沉的精神追求

人为本，德为先，能为上，行为善。“为政以德”充分彰显了良好政德的感召力、凝聚力和影响力，也体现了人们对“为政之道、德在其首”的认同和推崇。《论语·为政》中讲：“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篇》在《论语》中仅次于《学而篇》排列，一方面强调“为政”是人道之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也强调人的道德品行在“为政”中的重要性，是做人、做事、做官首要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孔子的为政思想中，政治与道德、伦理密不可分。依据传统儒家观点，“德”是一个人最应该具有的品质，也是其内心最真实的表现。被誉为儒学总纲的《大学》开宗明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止于至善”。强调做学问的目的在于彰显至善的品德，再推己及人从而实现天下大治。中国传统政治本着治国平天下的宏伟抱负，凝聚了

诸子百家的思想要旨，以修齐治平为根本、以仁为核心、以中庸为境界，在政治思想上提出和阐述了“为政以德”的社会治理思想。

“为政以德”作为一个完整的政治伦理思想体系，承载着先秦儒家治国平天下的雄心。其突出强调道德对政治的深远影响，主张以“仁政”作为治国理政的主要准则，包含政者正也、克己复礼、德主刑辅等方面，以“仁”与“礼”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为政以德”思想体系的思想基础、逻辑起点和主要内容。一方面，从内在的角度对人们的言行进行约束，通过道德协调各种矛盾，进而达到治理社会的目的，并同时重视强调为政者的主导地位与关键作用，将为政者的道德素养看成治国理政的关键与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则要求执政者必须以道德作为着眼点，以各种道德规范为基础，如孝、悌、忠、恕、礼、知、勇等，并将其自觉化为各种政治原则，从客观上升级了道德的作用，使其与其他国家治理手段进行有效的融合，以此来促进社会的安定与和谐，维护统治者政权的稳定性。《孟子·离娄上》中指出，“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这些都是强调为政者的道德素养及其表率作用。正因如此，儒家围绕为政在人的主导地位，提出修己正人的品德修养、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克己奉公的道德操守等三方面的为政素养，主

张选贤举能，认为为政者的道德素养是国家治理的逻辑起点，是解决一切政治、社会问题的总根源，为政者的“修身”问题直接关系政治的得失成败、国家的兴衰治乱。

先秦儒家“为政以德”的社会治理思想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影响巨大。儒家强调为政者首先要“其身正”，做到“恭、宽、信、敏、惠”“尊五美，屏四恶”等，尤其做到要求民众做好的首先自己要做好、要求民众不做的自己首先不要做。《周易·系辞下》更是提出，“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一定意义上说，“为政以德”治理思想的重心不在“治民”，而是在“治官”以达到“为民”的目的。因此，“为政以德”思想是对传统社会治理的理性思考和远见卓识，是一种心存敬畏，忧道、忧民、忧己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和危机感。宋孝宗在《原道论》中谈道：“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由此，中国传统社会以儒家为主，辅之以道家释家法家，“儒释道法”一起构成传统文化的主干。唐以后的历朝历代，统治者对于儒家“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在承继方面虽有所损益，但也基本沿袭了其中的要害与精髓。也正因为儒家“为政以德”治国方略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突出作用，从而奠定了儒家思想成为传统社会正统思想的地位。

中国共产党人对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深刻诠释与模范践行

中国传统社会从人道与政治、君主与民众、手段与目标、职责与素养等关系层面，贯通天命人性，使“知天命”与“尽人事”统一起来，将正世道人心即推崇仁义道德作为解决政治问题的着力点和关键环节，提出“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核心理念及原则要求，对建构什么样的政治、社会如何良性发展以及如何达成理想社会，为谁执政、让谁执政、如何执政等方面给予总体建构与设计，内在地贯通“民为邦本”“为政以德”治理思想的内在逻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历史的长河中，那些帝国的崩溃、王朝的覆灭、执政党的下台，无不与其当政者不立德、不修德、不践德有关，无不与其当权者作风不正、腐败盛行、丧失人心有关”。由此可见，“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等蕴含着丰富的治理思想与政治智慧，挖掘、总结其中丰富的治国理政的思想理念、政治智慧和文化精髓，是时代赋予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

中华文明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相遇，书写成就人类文明史上大大的“人民”两字。1925年，郭沫若曾创作过一篇名为《马克思进文庙》的小品

文。在郭沫若笔下，马克思与孔夫子跨越千年在上海文庙相遇，双方相见恨晚。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如何实现人的解放、如何让更多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从早期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共产党宣言》，再到《资本论》等，是马克思一生奋斗且一直念兹在兹的伟大目标和人生命运。唯物史观强调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观点激活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并促进其创造性转化，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民本思想进行创造性阐释的核心思想资源。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申明：“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党的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物以美为资，官凭德服人。对于治国理政而言，“民为邦本”“为政以德”正是实现良政善治的支点。“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等，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扬。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新时代党员干部的政德既是首要的、第一位的，也是个人立身为政之基，更关乎民心向背、政权兴衰。有了良好的政德作保证，做人才有底气，做官才有正气，做事才会硬气，才能真正地践行“坚持人民至上”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会真正地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与人民风雨同舟、与人民心心相印，想人民之所想，行人民之所嘱，不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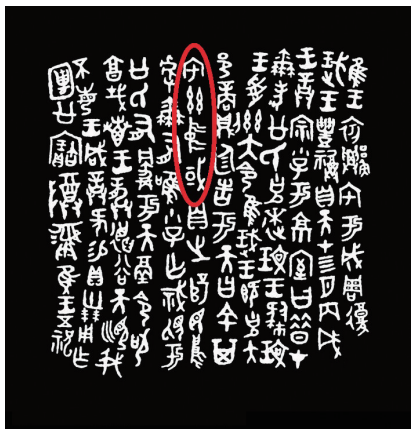
从何尊铭文看『中国』文明奠基

□王永超 娄培玉

2023年6月2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中国历史研究院内的中国考古博物馆，先后参观文明起源和宅兹中国专题展，了解新石器时代和夏商周时期重大考古发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认识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感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离不开考古



何尊



何尊铭文修复拓片中的“宅兹中国”

学。要实施好“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做好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和阐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考古学对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意义、新石器时代和夏商周时期深厚的文化积累对于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的奠基作用，为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推进中国上古文明考古学研究，发展新时代考古事业指明了方向、明确了目标、提供了遵循。

发现“中国”

出土文献是考证历史的一手资料。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国家建设的开展，大量地下文物得以重见天日。1963年8月，离西周原遗址不远的宝鸡市一陈姓人家在无意间发现了一件铜器，这件器物高38.8厘米、口径28.8厘米、重14.6公斤，即使饱经历史风霜，也难掩其造型之浑厚、工艺之精美。然而在当时，该铜器还是沦为这户人家盛粮食的器皿。1965年8月，陈家又把这“废铜烂铁”卖到了废品收购站……所幸天佑文脉，后因宝鸡市博物馆干部慧眼识珠，断定其为周代青铜尊，这件文物才辗转到了宝鸡市博物馆（今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至此重获归宿。

1975年，青铜尊要去日本参加中国青铜器展。出国前夕，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看它外表张扬繁复、十分精致，腹足更有精美的高浮雕兽面纹，角端突出于器表，体侧并有四道扉棱，想必当有更加深厚的历史渊源，于是便对青铜尊进行清理，清理过程中竟又收获惊天之喜——工作人员在尊内底部发现了西周早期所铸、遗落千载的铭文！制成拓片一看，这篇极为重要的文献计122个字，记载了周成王亲政五年时，于新营建的东

都洛邑对其下属“宗小子”的训诂，其中提到武王在世时决定迁都于洛邑，即“宅兹中国”，与《尚书》中的《洛诰》《召诰》以及《逸周书·度邑》等文献记载可资互证，起到了证实补史的作用，为西周历史的研究和青铜器的断代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由于该青铜尊乃是何叫的西周宗室贵族所做的祭器，考古学界遂命名其为“何尊”。

何尊铭文写道：

唯！王初薨，宅于成周，复稟武王豊福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尔考公氏，克逃文王，肆文王受兹大命。

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呜呼！尔有虽小子亡识，视于公氏，有助于天，彻令。敬享哉！

唯！王恭德裕天，顺我不敏。王咸诰：何，赐贝册朋，用作康公宝尊彝。

唯！王五祀。

铭文内容主要包含四部分：一是王迁宅于成周与祭祀武王；二是何的先人公氏曾辅佐文王；三是武王克商后说要居于“中国”；四是王勉勵何能像其先人公氏，并加以赏赐。通篇文字最为学界所瞩目的莫过于其中出现的“宅兹中国”四字，这是现存文献中发现最早的“中国”一词，其意义不言而喻、其价值难以估量。

重新认识到何尊铭文的历史文化意义之后，宝鸡博物馆说，这是我们镇馆之宝啊！马承源回应：这是镇国之宝。

从此，“宅兹中国”成为学界一绝大题目，引发专家学者立论无数。

何以“中国”？

何尊铭文中最核心的概念“中

国”当作何解？是否当从地理方位、政治内涵、治理模式乃至宗教文化等不同层面对“中”进行多元化诠释？西周初年的“中国”概念是否为对夏商文化的一脉相承与“损益”？此一“中国”对后世“中国”历史有何关联，与绵延至今数千载的“中国”文明体又有何渊源？

“中国”相关的系列问题近年来成为学界热门话题。许多学者都认为重新界定或理解“中国”这一概念至关重要，不同领域学者都参与了讨论：葛兆光《宅兹中国》试图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许宏《何以中国》讨论早期“中国”的形成，许倬云《说中国》讨论“中国”这个复杂共同体的历史，刘晓原《边疆中国》，李零《我们的中国》，王赓武作《更新中国》报告等，各路学者都基于各自的学术领域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可谓精彩纷呈。

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中国”的称谓始于西周初年的何尊铭文，但我们并不能保证将来是否会发掘出比何尊铭文更加古老的对“中国”的文字记录，因此如欲对“中国”作一知识考古学，便不得不追溯到“文献不足征”的夏商时期。关于古史考证的方法论，陈寅恪曾概括王国维二重证据法为“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印证”，也就是说，如果想厘清“中国”概念内涵，在借鉴学术史成果之余更需要“得地下之新材料……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当然也离不开对传世文献的充分掌握，以期对历史文化进行立体化的阐释和解读。

根据《史记·五帝本纪》的记载，早在舜帝时即已萌发“中国”意识：“崩崩，三年之丧毕，舜让避丹朱于南河之南……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是为帝舜。”此处“中国”似为地理方位中心的意思；而《尚书·仲虺之诰》则有“王懋昭大德，建之于民”。意为“欲王自勉，明大德，立大中之道于民”，也就是说到商代时作为地理方位的形式之“中”已被引中为寓意“大中之道”的“中”。其实细究起来，“王者居中”作为中国古代文明政治理念最早可见于《史记·五帝本纪》，“帝嘗践中而遍天下”即已蕴藉择“天下”之“中”而处之的内涵，若以此反推，则夏商周三代“中国”所寓意的“中道之国”内涵恐怕是一脉相承的。在这个意义上，何尊铭文所载周初重新来一次“宅兹中国”以求取“天下之中”的重大政治活动，正是对夏商“大中之道”的

继承。

从武王、周公到成康，西周对“中”的持续重视均来自文王，而文王则是对夏商“建中于民”理念的深化。“清华简”《文王遗训》运用三个典故，讲的都是“中”，既有形式的“中”，更有寓意的“中”，可见“中”正是周文王治国平天下的核心理念。夏商至文王一脉相承的“中道”塑造了武王和周公，因此才有武王上告于天：“余其宅兹中国”；才有周公、成康择“地中”营建洛邑；才有《周礼·天官》和《周礼·地官》开篇“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极”就是“中”，“以为民极”就是“今天下之民各得其中，不失其所”，这里“中”显然是一种政治文化寓意，周就这样把夏商所倡导的“建中于民”的思想深化为了后世儒家中国的基本政治理念。

通过考述三代文明的“中国”概念可以看出“中”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核心。到孔子创立儒学时，这一理念更被明确地抽象总结出来。《论语·尧曰》：“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本篇以“尧曰”为题，似乎不单单是径取首二字以名篇，而有深意在焉。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八云：“《论语》终于《尧曰篇》，《孟子》终于‘尧舜汤孔子’，而《荀子》亦终于《尧问》，其意一也。”邢昺《论语注疏》：“此篇记二帝三王，及孔子之语，明天命政化之美，皆是圣人之道，可以垂训将来，故殿诸篇。”从某种意义上讲，此章实已逸出《论语》本文之外，再度将时空界限伸展至远古，对自尧帝至孔子诸圣人之“法语之言”予以表彰，盖以明圣人道统之传递，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立法垂范！尧帝告诫大舜，《尚书·大禹谟》记作：“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此“十六字心传”，实为圣王治道要诀，千古不刊。“允执厥中”四字最为紧要，点明先王之道，在中庸守常，诚如郑玄所言：“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中和之为用，中庸即“用中”，就是恰当地把握中道，在人心和道心之间不偏不倚地允执厥中之道，须臾不可或离。

在儒家这一道统叙事谱系中，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到孔子，上古先圣先王所传的正是“中”之道，“中道”是贯通二帝三王与孔子的纵贯原理。三代以上帝王的中道原则与宇宙论王制捆绑在一起，是一种体制化的

秩序，在那种关联中，宇宙被想象为一个国家，映现了政治社会。从王者也会更替的层次来说，人受制于王、王受制于天、政治受制于宇宙、历史受制于礼法，王者唯有以“中道”才能获得统治的正当性，所以登基典礼就是基于“中”的统治权的仪式化宣示。

何为“中国”？“中国”就是作为一种文明而存在的“中道之国”。

“中国”再出发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地指出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如果从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这无疑是习近平总书记给出的理解中国的“金钥匙”，论断高屋建瓴，深刻阐发了全面深入了解“中国”古代文明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可能性、重要性与必要性。

墨子言，先圣先王言行事迹“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传遗后世”；《尚书》也说“天叙有典”“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有典有则，贻厥子孙”。随着大量考古资料的发现，今人在一定程度上有了比古人更多的资料，透过前人未见材料，与传世文献相印证，能激活太多信息，某种意义上使今人比古人更能接近上古历史真实轮廓，这为更深入认识中国古代文明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综合考古资料、传世文献与学界研究的推进，以一种理性的冷静回望过去，我们会发现从尧舜到夏商周时期，中华文明已有一个漫长的发展历程，并达到了一个文化积累无比深厚的高度。

基辛格在《论中国》开篇中就谈道：“中华文明的一个特点是，它似乎没有起点。中华文明不是作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作为一种永恒的自然现象在历史上出现。”基辛格的这一判断是值得重视的。

从孔孟荀到程朱陆王乃至现当代新儒家，中华文明始终在“中道”的引领下前行。如今，自觉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正是对尧舜禹文武周公诸先王以及孔孟荀程朱陆王诸先圣所一脉相承的“中道”的再出发。